

师抗日纪念碑。
八路军东渡黄河出



以史为鉴

“西安事变，一个发生在85年前的故事，仍然在打动着今天的观众。”第23集《古城风云》开宗明义。纪录片娓娓道来，抽丝剥茧，将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接触的经过一一道来，又对两位将军在西安事变后的悲剧人生作了客观的叙述。一句“来生还做张学良”，掷地有声，尽显英雄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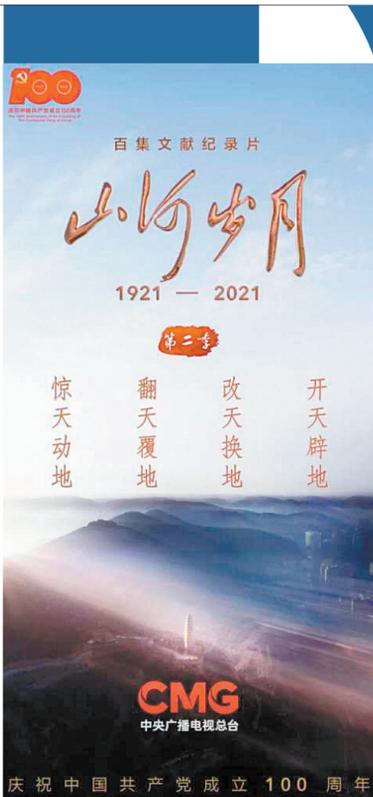
虽没有设问和形式上的作答，但《山河岁月》通过光影，更通过史实，努力为观众解答了“共产党人与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走到一起”以及“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这样两个疑问。

《挺进敌后》讲述了八路军东渡黄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事迹。武器装备极其落后的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的胜利，战斗力正来自坚定的信仰，来自对人民的忠诚。据悉，从《挺进敌后》到《白山黑水的记忆》(第25集)、《密林中的日记》(第30集)、《大江南北》(第31集)，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将徐徐展开。

而后，无论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第29集)，还是《宝塔山下》(第32集)、《军民大生产》(第33集)，都在讲述着关于延安的故事。毛泽东说：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先试。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整风，在这里召开七大。从六大到七大间隔17年，许多参加七大的代表在路上也走了一年半。《坚如磐石》(第35集)讲述了七大代表的事迹，也道清楚了为什么通过延安整风。理解延安整风与中共七大，就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可以由此从胜利走向胜利。

跟着迄今为止展示人物最多的一部红色纪录片——

放眼山河 回望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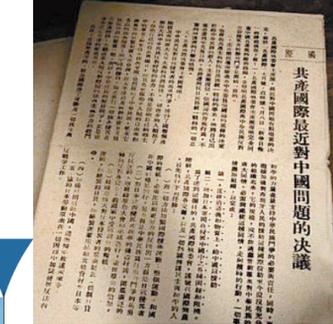
回望岁月

惊天动地 翻天覆地 改天换地 开天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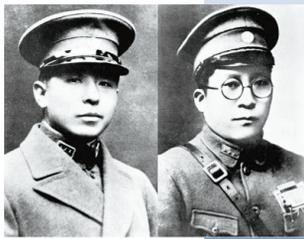
远方朋友

抗战时期的中国，一直有一批国际友人关注着延安。《不远万里》(第27集)讲述了一批外国友人与延安的故事。比如，马海德、白求恩、林迈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延安，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观察延安》(第37集)更直接通过卡尔逊、史迪威、谢伟思对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印象，以第三只眼睛看待红色中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特殊记忆。其实，对于一批手持照相机和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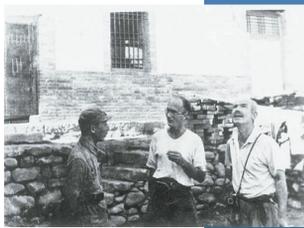
机的外国人来说，中国的两种前途与命运早已写就。《红色中国纪事》(第40集)将会讲述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战地记者卡帕、美国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法国摄影家布列松在中国的故事。他们已经看出的纪元就要开始。《山河岁月》是迄今为止容量最大的一部红色纪录片，也是展示人物最多的一部纪录片。从第一季到第二季，《山河岁月》努力还原关键场景、解读重要人物。



《共产国际最近对中国问题的决议》。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左)、杨虎城。



白求恩(右)、林迈可(中)、聂荣臻(左)在晋察冀根据地。

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土地诗篇》主题宏大，但导演选择以几位外国友人的视角，讲述了70年前那场伟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一年，几位外国人也参加了中国的土地运动，为我们留下了两部在中国很有影响的著作。韩丁的《翻身：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伊莎白·柯鲁克和大卫·柯鲁克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他们努力梳理同一个问题：共产党如何让农民获得土地。(据《新民晚报》)

三星堆“铜扭头跪坐人像”到底是啥身份？

专家这样说

日前，微博“三星堆考古研究所”发布了四号坑出土的铜扭头跪坐人像简报。简报展示了最新的铜扭头跪坐人像研究成果，对3件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初步判断是：并非单独个体，而是一件大型组合铜器的3个构件。坑里发现的条状铜器也是它的组成部分。

通过X光拍摄图像，初步判断这组人像为模范法整体浇铸成型。人像双手间与肩部发缝构成了一个卡槽，实用性很突出——应该是用来作为大型器物的支撑底座部件。

值得一提的是，人像所饰纹饰复杂多样，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皆为首次发现。青铜人像左右两侧小腿肚上的羽冠纹，是三星堆祭祀坑迄今出土的器物中新发现的一种纹饰，代表鸟的形象。由此亦可推知，鸟的形象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很突出的地位，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此前考古专家们对于三星堆巨大青铜树上人面鸟的形象是用来沟通天神与人间的推测。

据简报推测，这组人像所属的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他们双手呈现“合十”状平举的姿势，则是为了托举重物的功能需要，似与祭祀仪式关系不大。它们所属的复合型铜器或为祭器，但作为底座的人物形象，身份地位应较低下，并非神职人员。(据《成都商报》)

卫生纸上的“连环画”：人物需画近20遍

“《水浒传》108将已画了一部分，根据工笔画的白描人物创作了此系列。”山西省太原市，“95后”女孩史钊碧将四大名著、热播电视剧中的人物画在卫生纸上，拍成短视频发布网络受到关注。目前，她已完成“卫生纸画”30余卷。

史钊碧是一名自由画者，在她的家里，墙面随处可见她创作的各种类型绘画作品，记者在一张大书桌上看到了她创作的一卷卫生纸“连环画”。

史钊碧告诉记者，10年前，她上幼儿师范学院时接触美术并爱上画画。今年5月，她无意中看到网上了一幅百鸟图，觉得很有趣，便开始将“80后”“90后”记忆中的卡通人物、电视剧人物形象等画在卫生纸上。

卫生纸上作画对纸巾要求较高，史钊碧选择的是一种比较平整，没有任何纹路的卫生纸，画笔也分为两种，较粗的笔适合画人物轮廓，细笔完善人物五官等细节。“卫生纸材质特殊，用力太重会戳破纸，太轻线条不连贯。”史钊碧说，卫生纸上画画最难的是需要一笔成形，没有办法修改。“在卫生纸上作画需要很大耐心”。

为一次性画好每个人物，将人物细节体现出来，每个人物需花费近1个小时才能完成。“每个人物需要画十几遍，甚至二十几遍。”史钊碧坦言，这对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作品完成后，史钊碧会将画放到透明的箱子里，存放在比较干燥的地方保存，避免阳光直射照射，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虽然有时候一直坐着画画很枯燥，但我很享受这个安静的过程。”史钊碧说，她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社交平台后，会有一些人提出质疑，但更多的是一些温暖的鼓励，“有很多人支持我，我就一定会坚持画下去。”(据中国新闻网)

《我和我的父辈》定档国庆节 聚焦“小家”故事 诠释伟大亲情

继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和2020年的《我和我的家乡》后，该系列第三部影片《我和我的父辈》定档今年10月1日上映。

《我和我的祖国》以时间为序，《我和我的家乡》以空间为轴，《我和我的父辈》则以世代为章，聚焦每一个“小家”生命延续的故事，追忆4个不同时代的集体回忆，诠释平凡而伟大的父母亲情，以及父母与子女间最深刻的情感羁绊。预告片中，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4位导演集体亮相。吴京执导的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涉及大量骑马的戏份，技术难度大、风险指数高。章子怡则素颜亮相饰演一位母亲，她表示：“我们是在用真挚浓郁的情感，来表达对父辈们无私奉献的敬意。”徐峥是唯一一位执导了这三部系列片的导演，谈起自己的三度创作，他表示自己导演的这部分戏，把视角放在了改革开放这个创新的年代，希望释放一种情怀。首次担任导演的沈腾则表现出严肃认真的一面。他表示，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将多年的喜剧经验呈现在银幕上，给观众带来新的欢笑。(据《天津日报》)



日前，在荷兰乌得勒支的一所博物馆，视觉障碍人士触摸艺术品。这所博物馆举行名为“盲点”的展览，展出艺术家创作的可用触觉和嗅觉感知的作品，让视觉障碍人士通过特别的方式欣赏艺术。(新华社/路透)



近日，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内的东方艺珍(北京)设计园建设完成，园内布置了10个展示体验馆及1个直播基地，花丝镶嵌、景泰蓝等“燕京八绝”非遗技艺悉数亮相。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摩精美工艺，还可以上手体验制作环节，在参与中了解、传承非遗。图为非遗传承人展示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据《人民日报》)

考古学家发现北魏时期最完整的“拥抱葬”

日前，中外考古学家对2020年发现于山西省大同市的一例北魏时期(公元386年-534年)“拥抱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生物考古学研究，该成果近期发表在《国际生物考古学期刊国际骨考古学杂志》上。

据介绍，该墓葬是一座同穴单棺合葬墓，男性墓主身体向左侧卧，面向左侧，右手搭在女性墓主腰部，将女性墓主环抱在怀中；而女性墓主身朝右侧男性墓主，头枕在男性墓主的肩部，左手自然扶在男性墓主腹部，左腿微微弯曲，且左手无名指处戴有一枚银色素面指环。通过骨骼分析发现，男性墓主的右臂存在未愈合的感染性骨折创伤，而女性墓主的骨骼则较为健康，两位墓主紧密拥抱在一起，姿态自然、动作舒展。

该项研究成果由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侯晓刚、吉林大学教授张全超、厦门大学副教授张群、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教授王谦等多个单位的考古学家合作完成，是生动反映中国古代民族融合背景下人类生死观、爱情观等社会思潮的具体物化证据，体现了生物考古学研究在阐释人类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巨大潜力。(据中国新闻网)

探访古籍修复师：用匠心“医治”古籍

在残卷中“复活”文明记忆

今天“坐诊”的古籍修复师是年近60岁的尹光华，她的“患者”是清朝古籍《近思录》。

尹光华告诉记者，古籍是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纸寿千年，绢寿八百”，在时间的考验下，古籍很难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这就需要古籍修复师去修补那些残损。

尹光华一边介绍古籍修复知识一边修复《近思录》。桌面上摊着一张反面朝上的书页，只见她用毛笔蘸水润湿书页，用小镊子将破损部位舒展开来，再用毛笔蘸着浆糊，一笔一笔刷在破损的边缘处。说话时，手下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小心。随后，她拿出桌子上经修复后压平的书页，仔仔细细地检查“补丁”的存在。

昏暗的残页，是时间的痕迹。尹光华耐得住寂寞，用一双巧手和古籍修复的匠心，让古老的文字、泛黄的纸张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类似这样的书页十几分钟便能修复好，但前期打浆糊要花一些时间，外面买的浆糊有漂白剂和防腐剂。”为防止纸张造成损伤，修补时所用的浆糊都是尹光华手工调制。尹光华表示，这些年来，她积累了不少古籍修复的经验，古籍存在的问题她凭经验就可判断出来。此外，她还会抽时间研习古籍，学习纸张理论知识。

“古籍留存至今，虫蛀、发霉、酸化、断线等‘伤病’是常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修复古籍要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修复。”尹光华说，“修旧如旧”说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较为繁杂，处处都是讲究。每拿到一本古籍，尹光华首先要查看并记录破损情况，同时制定修复方案，再据方案对古籍进行清洗、配纸、修补、捶平、去边、压实、装订……整个过程前后有几十道工序，每一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小心翼翼，屏息凝神。”尹光华笑言，一个喷嚏、一次深呼吸，都可能让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古籍修复容不得任何失误。

尹光华表示，一本破损严重的古籍，要耗费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彻底“复原”。而在40多年时间里，她先后修复了1991年贺兰山拜寺口双塔出土的5.74米长的佛经长卷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一批珍贵的古籍藏书。如今，仍有一大批古籍“等”着她妙手回春。

“有些书再不修就灰飞烟灭了，我要尽可能地修复它，让它活得更久一点。”她告诉记者，全国约有5000万册古籍，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修。“未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修复更多濒危古籍，进而为这些文化瑰宝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续利用、薪火相传贡献一份力量。”尹光华说。(据中国新闻网)



尹光华在修复古籍。



尹光华查看修复后的古籍。